

附件 2

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结项申请书

立 项 编 号 BZ25YB111

项 目 类 别 一般项目

项 目 名 称 巴中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研究

项 目 负 责 人 文茂群

所 在 单 位 四川文理学院

填 表 日 期 _____

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

2025 年 3 月

声 明

本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享有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利，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特此声明。

成果是否涉及敏感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是□ 否□

成果是否涉密： 是☒ 否□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适用于巴中市社科年度规划项目、专项项目等结项申请。

二、认真如实填写表内栏目，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项上打“√”。课题申报信息无变更情况的可不填写《项目变更情况数据表》。

三、本《结项申请书》报送 2 份（A3 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并附最终成果打印稿（正文格式要求：主标题 2 号方正小标宋简体，其中一级标题 3 号方正黑体-GBK，二级标题 3 号方正楷体-GBK，三级标题 3 号方正仿宋-GBK 加粗，正文 3 号方正仿宋-GBK）。

四、所有结项材料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县（区）申报者报送所在县（区）社科联审核后统一报送至市社科联，其他申报者可直接报送市社科联。

一、项目变更情况数据表

立项项目名称		巴中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研究									
结项成果名称		巴中红色家风的双重镜鉴——刘伯坚和周永开家教家风及实践意义									
是否变更		A、是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B、否			变更的内容						
原计划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			现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			
原计划完成时间		2025 年 10 月 20 日			实际完成时间			2025 年 10 月 20 日			
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变更情况											
原 负 责 人	姓 名	文茂群		性 别	女		民 族	汉		出生日期	197 年 10 月
	所在单位	四川文理学院			行政职务		教 研 室 主 任	专业职务		副教授	
	通讯地址	达州市通川区塔石中路 519#					联系电话		13547237536		
现 负 责 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所在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原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联系电话			

参与人员	孙杰	四川文理学院	教授	
现参与人员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联系电话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审核事项:1.成果有无政治导向问题或其他不宜公开出版的内容;2.最终结果的内容质量是否符合预期研究目标。）

签 章
年 月 日

三、县（区）社科联意见

（审核事项:1.成果有无意识形态问题;2.是否同意结项。）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四、专家鉴定意见

(请在对应意见栏划“√”)

1.成果有无意识形态方面问题： 有 ☐ 否 ☐

2.是否同意结项：是 ☐ 否 ☐

3.鉴定等级：优秀 ☐ 良好 ☐ 合格 ☐

主审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五、市社科联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巴中红色家风的双重镜鉴

——刘伯坚和周永开家教家风及实践意义

摘要：刘伯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爱国家风，和周永开“勤俭持家、清正廉洁”的廉洁家风，犹如巴中红色家风的“双子座”，成为巴中家风建设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巴中推进家风建设，应该从故事化梳理、学理化挖掘、实践化运用的三从维度，重视对刘伯坚和周永开红色家风的深入研究和推广。

关键词：刘伯坚爱国家风；周永开廉洁家风；故事化；学理化；实践化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将其视为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加强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凸显了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局中的关键地位。随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部署，明确提出“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这一重大改革任务。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家庭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已深度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生动彰显了中华传统家风文化资源在当代社会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与治理效能。

在博大精深的家风文化谱系中，革命先辈孕育的红色家风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诞生于血与火考验、熔铸了坚定理想信念和崇高道德情操的红色家风，是赓续红色血脉、滋养时代精神的宝贵财富，为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滋养与实践典范。巴中，这片承载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城市的肌理与血脉之中。刘伯坚烈士“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铮铮誓言及其感人至深的《红色家书》中所展现的坚定信仰与浩然正气，周永开同志“一生忠于党，赤诚为人民”的公仆情怀及其清廉自守、艰苦奋斗的优良家风，正是巴中籍革命家红色家风的杰出代表。这些由巴中儿女用生命和热血写就的红色家书家风，是巴中弥足珍贵、不可替代的特色文化资源。它们如同两盏穿越时空的思想明灯，以其具体、生动、可感可学的精神力量，不仅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更为当代巴中市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高尚道德品格提供了清晰可辨、触手可及的精神坐标与行为范式，持续引领着社会风尚。

一、刘伯坚的家国情怀

（一）生平简介

刘伯坚(1895-1935)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人，也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2019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895年1月一个雪花飞舞的冬夜，刘伯坚降生于今四川省平昌县龙岗乡一个商人家庭，父亲经营小商业，母亲辛勤耕种2亩薄地。刘伯坚出生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打得如火如荼。3个月后，中国大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惨败的耻辱强烈地刺激着全国各界，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大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迅速在各地滋长和蔓延。民族危亡的压力始终伴随着刘伯坚的成长，救国救民于水火是他一生不变的志向。

从1902年-1917年，刘伯坚相继接受了私塾、高等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17年冬天，在万县省立川东师范学校辍学后，他短暂地担任过苍溪县知事。1920年8月，刘伯坚作为第十四批法勤工俭学生，乘坐法国博尔多斯号邮轮抵达法国马赛港。留法期间，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艰苦的实践斗争，刘伯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加入旅欧共产主义小组，从此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11月，刘伯坚接受党中央安排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被选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9月，受冯玉祥邀请，刘伯坚回国担任西北军政治部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再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成功策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宁都起义，并以此为基础建制红五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掩护中央主力部队撤退，担

任新成立的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继续战斗在中央苏区一带。1935年3月6日被俘后，怀抱“生为中国生，死为中国死”的坚贞爱国情，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方诱降，于同年3月21日，凛然就义于江西大余金莲山下，时年40岁。

（二）家庭档案

刘伯坚祖籍江西灌洲郡青华山，曾祖父清乾隆年间客居四川经商，几经辗转后定居今平昌县境内。刘伯坚之父，刘显贵，号天一、尊山，为人正直敦厚。刘父少年时熟读《四书》、《五经》，十五岁到巴州应试，因巴州科场黑暗，答卷优秀而不中。为泄愤懑，刘显贵报复性地花钱买了一顶秀才帽子，被乡亲们戏称为“捐班子秀才刘老爷”。刘伯坚母亲苟继显，出生于书香之家，虽然没有念过书，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勤劳朴实，为人善良真诚，热爱子女家人。刘父经商，刘母种地务农，刘家家境殷实，属于典型的耕读家庭。因为祖辈家境小康，刘伯坚的叔伯也都是读书人，有的还是当地的教书先生。刘伯坚的外祖父也是当地颇有声望的文秀才，舅舅们都是受过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的读书人，外公和舅舅都曾经担任过刘伯坚的私塾老师。

刘伯坚作为刘家的长房长子，深得父母和家族宠爱，从小就被寄予厚望。为保佑他顺利长大，父母按照川东北农村风俗给他取了一个很容易养活的小名——“孬和尚”。刘伯坚三岁时出水痘，发高烧昏迷了三天三夜，父亲害怕他夭折，接连给他拜了10个“保保”（干爸）保佑他，其中还有一个寺庙的和尚。刘伯坚自幼聪敏，身体健康，好打抱不平，会一些拳脚功夫。在他成长和求学过程中，父母数度咬紧牙关，举全家财力，供他外出求学，直至他在法国真正走上革命道路。

刘伯坚之妻王叔振，1906年7月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的一个商人家庭，是兄弟姐妹6人中的老幺。王叔振自幼聪颖开朗，深得父母兄嫂的喜爱。1920年考入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在哥哥的影响下倾向革命。刘伯坚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政治部工作时，邂逅了小他11岁的王叔振，1927年4月二人结婚。婚后，王叔振在西北军总政治部任秘书工作，并在刘伯坚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叔振与刘伯坚夫妻情深，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婚后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王叔振是一位坚强能干的女革命家，也是刘伯坚革命工作的贤内助，从不因小家庭拖累和影响刘伯坚的革命工作。刘伯坚在1928年春第二次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后，年轻的王叔振身怀六甲举目无亲，一边继续从事着党的地下革命活动，一边躲在上海的亭子间待产。因战争环境的残酷和革命工作的需要，王叔振在大儿子刘虎生3岁时，就把他送给避居上海的哥嫂抚养，直到夫妻双双牺牲都未能再见一面。小儿子刘熊出生仅三个月，王叔振就听从丈夫安排，忍痛将他送给闽西的革命群众抚养，只身投入革命，并从此母子永别。1935年2月，留守中央苏区的刘伯坚在一次突围前，将5岁的二儿子刘豹生寄养在当地进步贫农郭贱姑家。为保护烈士遗孤，郭贱姑将刘豹生改名为邹发生，对外宣称他是从广东买回来继承香火的。

刘伯坚夫妇在1935年牺牲后，大儿子刘虎生被周总理派人找到，在延安保育院长大成人，1947年被党组织派到苏联留学，1955年学成归国，为我国的国防工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刘豹生是被郭贱姑照料下长大的。由于郭家家境贫寒，刘豹生自然没有机会读书学习，1949年10月党组织在江西找到他时，他已是20岁的成年人了，但却一字不识。被党组织接到北京后，刘豹生仅用三年时间即读完了小学，

中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事航空航天工作，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贡献。父母牺牲后，刘熊生被养母邱满菊艰难地抚养成人。1953 年党组织派人找到了已经上高中的熊生，当他得知养母为了养活自己而卖掉了自己的亲骨肉时，断然拒绝了党组织对他的返城安排，认为自己应该留在农村为养母养老送终。令人唏嘘的是，直到 1979 年，刘家三兄弟才在党中央的组织下第一次见面，此时他们都已人到中年。

（三）家风故事

刘伯坚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守党的理想信念的光辉典范。刘伯坚出生于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偏僻落后的“通南巴”地区，在父母家人的鼎力支持和自身不断追求进步过程中，由一个农家娃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无论生存条件多么恶劣，也不管革命工作多么艰苦和危险，刘伯坚的拳拳爱国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理想信念从未减少和动摇过。他与王叔振结婚组成自己的核心小家庭后，不但传承了原生家庭的优秀家风，还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家教家风。他在与妻子的言谈和书信交流中，时时勉励妻子要坚守党的理想信念，不要被革命的暂时困难和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吓倒。刘伯坚与王叔振结婚八年后，夫妻二人几乎同时牺牲，他们的核心小家庭虽然存续时间不长，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时间也极其短暂，孩子们甚至对父母都没有什么印象，但刘伯坚通过与亲人和妻儿的书信交流，在要求妻儿继承其革命遗愿的殷切期望中，将优秀家风传递给了子辈们。

1.充盈的正气

刘伯坚出生在一个善良、充满正义感的家庭。他的父亲刘贵显，为人真正，性情忠厚，少年时因不满科场黑暗，在科考优秀而不中的情况下，报复性地买了一顶秀才帽，以示对社会不公的反抗。刘伯坚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是温柔善良，勤劳朴实，诚以待人。刘伯坚的外公苟峨轩，也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的文秀才。刘伯坚师从外祖父苟峨轩、大舅苟骏声、二舅苟秉恒时，深受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熏陶，除熟读《四书》、《五经》外，特别喜欢背诵《正气歌》，读司马迁的《史记》。他从舅舅处得知了康梁变法的故事，他尤其喜欢梁启超的充满血性的《少年中国说》，把重要的章段，用毛笔誊写下来，贴在墙上，每天必看三次。祖辈和父辈的正直善良对刘伯坚影响较大，他在少年性格就颇具叛逆性，对于不公平现象非常反感，心中始终怀着惩恶扬善为社会打抱不平的“游侠梦”。

1903年春天，8岁的刘伯坚进入平昌县龙岗寺文昌宫义学堂读私塾，师从深受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易子仪先生。义学堂使用梁启超编写的《中国魂》作为教材，宣讲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并提倡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在《离骚》、《史记》等闪耀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影响下，刘伯坚决心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并给自己起名“刘铸”，意喻要“铸造成器”。为了强大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读书和习武两不误，为了有腾出时间练武，他学习比一般同学更加用功。随着学识和武功的增长，刘伯坚的“游侠梦”逐渐转化为惩恶扶弱的实际行动。

刘伯坚少年时期家乡一带颇有名气，因为他看不惯仗势欺弱的强人恶霸，仗着自己会功夫，常常为受欺辱的弱势者打抱不平。他在金斗寨读高小时，就成功领导了全校学生反对专横学监杨植的民主斗争。事情起因于，有一天营山学生胡文普误

入当地劣绅家的花园，被其诬告为想偷花，并被扭送到学监杨植处。专横的学监杨植不但不保护胡文普，还偏听偏信，认为胡文普偷劣绅家的花，违反了校规，将他毒打四十扁担后，还要开除学籍。刘伯坚愤怒质问杨植，为什么身为学监不但不尽伸张正义保护学生的本份，反而偏听偏信迫害学生？杨植不但不接受质问，反而阴谋继续迫害刘伯坚和其他反对他的学生。在刘伯坚的带领下，金斗寨小学掀起了反抗杨植的民主活动，加之学校创办者和校长也看不惯杨植迫害学生的反动行为，最终将杨植赶出了学校。

还有一次，刘伯坚在从万县川东师范学校放寒假回家的路上，遇到同乡的一个雇农，因生病被东家拒付工钱并赶出家门，在寒风中冻得簌簌发抖。刘伯坚见其可怜，遂拿出自己在学校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四个银元，叫他先去把病看好，再回去向东家讨要工钱。几天后刘伯坚再去看望这个雇农时，得知黑心东家不单昧了他三年工钱，还把他毒打了一顿。刘伯坚非常气愤，决心带着雇农上东家门，为他讨回公道。东家责问刘伯坚堂堂读书人，为何要帮一个泥腿子说话？刘伯坚回答说“道路不平大家踩”，并好言相劝对方应该把工钱付给雇农。东家不但不给钱，反而污蔑雇工懒惰成性，并蛮横地挑衅刘伯坚说“就是不给工钱，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要打官司，奉陪到底！”刘伯坚怒不可遏，挥拳把恶霸东家打得抱头求饶，当即一分不少地付清了雇工三年的工钱。

刘伯坚从父祖辈的家风家教中熏陶出的凛然正气，不但使他青少年时代即扬名家乡，还成为他从事革命斗争的精神动力。1935年3月刘伯坚被捕，在多次拒绝国民党诱降后，粤军将官余汉谋为了达到既扫刘伯坚的颜面，又恐吓苏区老百姓的

双重目的，故意把刘伯坚押到街上示众。刘伯坚拖着伤腿，坦然面对夹道围观的群众，即兴对群众吟诵了《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世人皆惊怍，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带镣行》是一首直抒胸臆的正气歌，诗歌表明，刘伯坚并不认为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拉来游街示众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支撑刘伯坚坦然面对牢狱之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正是他心中充盈的解放工农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就源自于他幼时从父辈和祖辈那里受到的熏陶。

刘伯坚 1935 年 3 月 16 日写给妻舅的信中，劝慰王叔振的兄嫂们不要为他的牺牲难过。他反复叮嘱亲人们不要去麻烦与他私交不错、但所走革命道路不同的于

右任和邓宝珊两位朋友，不要让这两位朋友因为他的事情感到为难。冯玉祥曾跟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刘伯坚与他的关系几乎决裂，他不愿意让冯玉祥知道自己被捕，更不愿意接受冯玉祥可能的出手相救，认为若果这样就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他告诉兄嫂说：“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要把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笔者注：这里的“马二先生”是暗指冯玉祥）知道，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¹可见，刘伯坚宁死也不愿接受他认为人格有瑕疵的人的施舍或营救，也是源于他家风中的浩然正气。

2.浓烈的爱国情

受家庭氛围和甲午战争后全国高涨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氛围影响，刘伯坚少年时代就养成的好打抱不平的性格特点，这是他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源头。刘伯坚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当时颇有文化的读书人，他叔叔是秀才，也是他的发蒙老师，他的外公苟峨轩性格严谨，很有民族气节，一生不求功名利禄，甘愿在乡村隐居讲学，也曾是他的私塾老师。可以说刘伯坚的家风是直接孕育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土壤和温床。特别是在外公和舅舅们的影响下，刘伯坚的爱国热情越来越浓烈，这一时期他自号“铁侠”，并暗自在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改造旧社会的宏伟志向。成年后，他立身行事一切都以国家民族需要和利益为重。

1917年冬，因川东北军阀混战，刘伯坚无法继续在万县师范学校完成学业，被迫辍学。辍学期间，他曾短暂加入过嘉陵道尹（府邸在今阆中市）陈炳坤（地方军

¹ 孟少康.刘伯坚就义前的三封家书[J].福建党史月刊, 2012(13):50.

阀和土匪)部。由于才华出众,刘伯坚深得陈炳坤的赏识,成为他的秘书,并在不久后被陈炳坤举荐为苍溪县知事。因不满意陈炳坤虚伪残暴的军阀性格和作风,刘伯坚深感自己投错了阵营。1918年8月,他亲自到阆中嘉陵道尹府邸,向陈炳坤面辞苍溪县知事,并婉拒了陈的再三请留。在返乡途中,面对姨夫刘伯敷的“令侄官至知县,进身有阶,为何还要辞官还乡?”的询问时,刘伯坚第一次向外人表露了他的救国志向,“当今之世,虎狼当道,饿殍满地,侄儿不图升官发财,只望求知报国……”、“我将准备到国外求学深造,以实现济世救民的志向。”²这番肺腑之言说明,刘伯坚对自己的人生志向已经从年少时好为弱者打抱不平的江湖好汉,上升到救国救民的宏伟目标了。

刘伯坚是家中长子,父母家人一直都希望他完成学业后,经商做生意,振兴家业。从苍溪辞官抵家后,他与父母之间就“忠于国”与“孝于家”的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并向父母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母亲温柔地劝慰刘伯坚,作为家中长子,父母把他养大成人了,应该为家庭承担一分责任,以减轻父母的压力。刘伯坚平静地告诉母亲“儿辞官还乡是为了外出求学报国,寻求革命真理。若是把儿留在家中,儿一腔热血,奋斗多年不是都付之东流了吗?”³父亲责问刘伯坚,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要抛妻别子,于心何忍?刘伯坚回答曰:“儿自巴州、万县求学以来,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如今,国家受难,民族遭危,大众疾苦,儿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古人都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况呼我辈热血青年……”。面对忠于国与孝于家之间的冲突,刘伯坚劝慰父母说“前几年,父母起三更、睡半夜,

² 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35.

³ 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37.

全家人口积攒，花费了很大的心血，送儿读书，儿真是终身感恩不尽，国家不能昌盛发达，乡亲们受苦受难永无出头之日，我有一片孝心又有何用？”⁴最终，父母退让，理解并成全了他的爱国情，选择了继续倾全家财力物力支持他实现求学报国的理想。

刘伯坚是怀着寻求救国良方的目的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到法国后，他参观了巴黎先进的制造业和机器生产后，深刻认识到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对于救国的重要性，决定在比利时沙瓦洛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在亲眼目睹了号称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故乡的法兰西的贫富差距和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后，他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习惯后，不是原有所想的美妙……”。意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最理想的救国良方后，刘伯坚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与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样，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才是救治中国的良方。1921年他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对革命救国就矢志不渝。

刘伯坚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妻儿影响很大。1931年，王叔振的第三个孩子即将临盆，刘伯坚将她送到福建连城乡下待产，自己则带着二儿子刘豹生，回到江西兴国的红一军总政治部，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为了避免王叔振因为带孩子影响革命工作，临走时刘伯坚对她说：“咱们有一个豹儿，已经拖累很大，妨害了革命工作。孩子生下后，取名熊儿，最好寄养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然后就在闽西一带做群众工

⁴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38.

作吧。”王叔振接受了刘伯坚安排，在三儿子熊生出生三个月后，她忍痛含泪为孩子的养家写下抱约：“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长大后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的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尽管孩子尚在襁褓，也不知母子有无再见的可能，王叔振依然叮嘱儿子长大后，既要为养家尽孝，也要继承父母的革命志愿，以此把爱国主义家风传递给了小儿子。送走儿子后，王叔振写信告诉刘伯坚：“.....毅伯，你说过的，为着革命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含着眼泪，把熊儿送人了。”⁵可见，刘伯坚的爱国主义情感深得王叔振的认同和支持的，这也成了他们小家庭的家风，成为夫妻二人留给孩子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刘伯坚被捕后，在写给兄嫂的第二封信中，也表达了自己准备以身殉国的坦然：“.....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⁶

刘伯坚夫妇牺牲后，尽管三个儿子天各一方，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父母身世和兄弟，但他们都很好地传承了父母的爱国主义家风。老大刘虎生和老二刘豹生二人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分别从事着祖国急需的机械工业和航空工业，可以说是继承了父母的爱国主义遗志，走上了工业报国之路。老三刘熊生得知养母为了保护他送走了自己的亲生女，并努力让他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后，拒绝了党组织的回北京安排，隐藏烈士后代的光环，踏踏实实扎根闽西农村，一边坚守母亲为养家“承先启后”的诺言，以报答养母的养育之恩，一边继承生身父母的革命遗志，在闽西农村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

⁵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225.

⁶孟少康.刘伯坚就义前的三封家书[J].福建党史月刊，2012(13):49.

3.坚定的理想信念

价值哲学认为，理想和信念是建立在真理确认和价值认同基础上超越现实、坚信未来美好结果的稳定、持久的观念。刘伯坚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以他从原生家庭中获得的正义感和读书求学过程中体悟到的朴素爱国主义情怀为基础，在法国后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之后，产生的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能救中国的坚定持久的观念和情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是统摄刘伯坚一切思想行为的最高价值目标。

1926年8月，刘伯坚接受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安排，陪同在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回到西北军，担任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帮助冯玉祥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王叔振初识刘伯坚时还只是一个进步女学生，在刘伯坚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组建成自己的小家庭后，刘伯坚将爱国主义升华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将之作为家风传承给妻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先后与汪精卫和蒋介石在郑州和徐州进行了会面，并在他们的蛊惑下一步步走上了反革命道路。6月22日，冯玉祥打出“清共”旗号，宣布解除刘伯坚的职务，追随蒋汪，公开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西北革命形势一夜突变，冯玉祥与刘伯坚二人分道扬镳。刘伯坚讥讽冯玉祥革命信念不坚定时，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教训冯玉祥道：“冯司令，主义的信仰，人的思想，哪能这样变化无常呀！我坚信共产主义能够给我苦难深重的祖国带来和平、昌盛、幸福和光明。”⁷

⁷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190.

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时，王叔振已身怀六甲，不得不与丈夫刘伯坚一起，从西安辗转前往党中央所在地上海。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郑州到武汉的流亡途中，眼见无数革命者抛尸荒野、血染大地，年轻的王叔振不免对革命前途感到彷徨。年长她 11 岁的刘伯坚虽然也痛心、悲愤，但他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不会轻易被反革命气焰吓倒。他鼓励妻子要坚定理想信念：“中国并没有面临末日，我们的历史刚刚开始。在血与火的白色恐怖中下，蕴藏着新的希望和生机。革命者对失败不悲观，不丧气。心中的理想不灭，就有勇气战胜困难，不怕挫折。”刘伯坚同时也提醒妻子：“今后一段时间革命将处于低潮，党的活动将转入地下，斗争会更艰苦，我们不能泄气。也许我们随时都会被捕，我们无所畏惧。以我们的生命和热血献给我们信仰的主义。”⁸刘伯坚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王叔振。

刘伯坚的理想信念坚定持久，即便在他被杀头时，依然不忘交代妻儿要坚定信念，继续革命。刘伯坚就义前对敌人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写家信，以叮嘱子孙后代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死后葬在梅关，要看着革命烈火到处燃烧。他在牺牲前一天写给王叔振兄嫂的信中，表达了中国革命必胜的理念：“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他特别要求兄嫂转告儿子们，要继续他未尽的革命事业。“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⁹1935 年 3 月 21 日，刘伯坚吃了断头饭后，给王叔振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表达的不是从此天人永别的儿

⁸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194.

⁹孟少康.刘伯坚就义前的三封家书[J].福建党史月刊，2012(13):49.

女情长，而是叮嘱妻儿无论怎样都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路线，要求儿子们长大后继承他的革命事业。“你不要伤心，望你们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路线并要尽一切力童，教育虎、豹、熊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¹⁰

4.家人亲情

革命者也是人，尽管他们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铮铮铁骨，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父母家人和妻子儿女，他们同样具有普通人一样的家人亲情。刘伯坚生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父母对他的爱孕育了他超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再把这份爱传递了妻儿，并培育了爱国主义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等优良家风。

刘伯坚儿时性格倔强叛逆，对教条的八股文不感兴趣。他在跟着外公和舅舅读书期间，曾经对武功痴迷到几乎荒废学业的程度，有时甚至为练武不进教室读书。被严厉的外公逮住后，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倔强的刘伯坚不愿向外公和舅舅认错求饶，最后被外公赶出学校。挨打后的刘伯坚忍着疼痛，蹒跚着悄悄回到家里，怕母亲生气不敢告诉她实情。发现他受伤后，不知情的母亲找到了父亲和哥哥，责怪他们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孩子。当得知刘伯坚是因为逃学被打时，母亲认为他因为学不专心、违反学规，该挨打。刘母央求父兄，只要能让刘伯坚读书，打死他都可以，但是不能不让他读书。当刘伯坚的外公和舅舅们得知他是因为不喜欢枯燥僵死的八股文才不想进教室时，在刘伯坚养伤半个月回到外公的学校后，他们改变了教学内容，还为学生们聘请了专门的武术教师，教学生们练习气功和武术。得

¹⁰郑学秋.刘伯坚、王叔振：夫妻喋血为革命[J].福建党史月刊，2001（02）：37.

知他把到手的官帽主动摘掉时，母亲并没过多责怪，当刘伯坚从苍溪县知事辞职到家时，母亲帮他整理好仪容后，拉着他向夹道欢迎的乡亲们一一施礼道谢。尽管刘伯坚的父母家人长期生活在乡下，丝毫不影响他们的情感交流。他求学期间思想认识上的变化，他都会写信与分母家人交流和分享。甚至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的认同及自己对救国思考的认识，他都会写信告诉父母亲人。

作为丈夫，刘伯坚很爱自己的妻子，但这种爱是建立志同道合的革命情感基础上的。王叔振非常崇拜刘伯坚的学识和能力，刘伯坚也非常喜欢外柔内刚革命激情满满的王叔振。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夫妻二人总是相互扶持，相互砥砺。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尽管年轻的王叔振不能特别理解革命形势，她还是温柔地宽慰刘伯坚，“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胜利。我永远相随着你，赴汤蹈火，在所不惜。”¹¹1928年刘伯坚第二次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离别前，刘伯坚拜托好友邓宝珊和张玉燕夫妇帮忙照顾产后不久的妻子和孩子，并对王叔振说：“我们说过，革命流血不流泪，我们今后虽远隔万水千山，但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王叔振也安慰丈夫，“走吧，我会照顾孩子的。”¹²1931他们的小儿子即将临盆，刘伯坚担心他们都带着孩子会影响革命工作，王叔振向刘伯坚保证，会妥善处理好孩子的事情，绝不会拖拉革命的后腿。产后四十多天，她就忍痛把小儿子刘熊生送给根据地群众抚养，只身投入了革命。刘伯在被国民党刽子手行刑前，留给王叔振的绝命书中，叮嘱她不要因为自己的牺牲伤心难过，无论在何种条件下

¹¹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194.

¹²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207.

都要努力革命，不脱离革命队伍。

刘伯坚与儿子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暂，甚至与老三熊生从没谋面，但他对儿子们的爱却很浓烈。刘伯坚牺牲前的三封家书都对三个儿子事情做了详细的安排。他嘱托兄嫂，要想办法把寄养在苏区群众家里的刘豹生和刘熊生接回家里自己教养，要求孩子们十八岁之前都要接受学校教育，十八岁之后到工厂上工，不要早婚和早生孩子，经济没有独立前不要结婚等等。他尤其要求儿子们要继承他的革命遗产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努力奋斗。

总之，刘伯坚是一个正气充盈、爱国主义思想浓烈、理想信念坚定、热爱亲人的革命者，他思想正、能力强。从祖辈和父辈那里收到中华优秀道德品质和家风的熏陶，并与时俱进地在把这些优良家风与马克思主义理性信仰融会贯通形成了红色革命家训家风，并把革命家风传承给妻儿，成为宝贵的家族精神遗产。

二、周永开的家风故事

周永开与妻子吴应明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经历过艰苦的革命生涯，接受了党的多年教育。新中国建立后，夫妻二人始终认为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抱着宁可“得罪家人亲戚”也不辜负人民的理念，拒绝用公权为家属、子女及亲戚谋取特殊待遇，对违背政策原则的私事请求和送礼一律拒绝。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宁可粗茶淡饭，决不取非分之财”，抵制奢侈欲望，拒受任何谋取私利的财物。在巴中化成真镇周家老屋的堂屋里，至今挂着一幅泛黄的《家训》，被周永开用红笔圈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自 16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周永开就把“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化作了持家治家的铁律。无论是担任巴中县委书记，还

是离休后扎根花萼山，他始终以“苛刻家人不亏人民”的信条，在家人心中树起一座清正廉洁的丰碑。他本人先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特别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93 岁的他更是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周家一门共产党员人数众多，从高寿逾百的老父亲到他的孙子孙女们全都低调朴实，没有一人因为家中有老革命老干部而有丝毫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成为党员干部家风建设的典范。

（一）周永开家庭档案

1928 年 3 月，周永开出生在巴中化成镇某富人家田角边上一个守庄稼的茅草棚里，父母都是这家人的长工。他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三个姐姐了周。尽管他一出生就被“神婆”指认为是“克姐克母”的不祥之人，但父母家人还是竭尽所能地给予了他全部的爱。生母早逝后，老实憨厚的父亲周作乾，不管家境非常困难，仍坚持送他到化成小学、奇章中学读书，为其接受革命思想、被恩师王朴庵领上革命道路提供了难得的机缘。继母翁仕秀虽言语不多，但在家庭中默默承担家务，支持周永开专注于革命工作，未因家庭事务干扰其革命活动。大姐周永莲是周永开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后盾，经常为他的革命活动担任警戒，保障他的安全。周永开的叔父周作伦虽然是封建会道门哥佬会成员，也经常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为他从事革命活动提供掩护。堂姐夫也利用国民党地方官员身份在暗中掩护他的革命活动。

在中共川北地下党组织活动期间，父亲倾力支持周永开加入中国共产党，还秘密为党站岗放哨、保藏秘文，以实际行动支持和保护儿子的革命活动。周永开从事地下工作时，多次深夜躲到姐姐家，姐姐虽有“唠叨”，却始终为其提供食宿掩护，

姐夫也帮忙烧火做饭、照顾生活。姐姐还主动承担起家庭与周永开之间的沟通桥梁，如父亲因周永开“失踪”担忧时，姐姐专程回娘家安抚家人、传递消息，避免因家庭矛盾影响周永开工作。在周永开需要转移或联络时，姐姐一家还自觉担负警戒任务，保障其安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周永开的叔父周作伦也利用自身的会党关系为他从事革命活动提供掩护。周家老屋是中共川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中心、情报交换中心和决策指挥中心，周作伦翁婿利用自己的旧关系有效地掩护地下党员的活动，长达五年之久。后来，川北区党委都分别给周一修和赵健安排了工作。这些为周永开形成革命家风奠定了深厚的家庭基础。

周永开的家庭虽然成分复杂，既有长工出身的父母，也有哥佬会成员的叔父、国民党官员身份的堂姐夫，但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家人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持、默契配合的紧密联系。这种在艰难环境中凝结的亲情与革命情谊，让周永开从小就深刻体会到家庭作为革命后盾的重要性，也让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树立起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切的坚定信念。家庭中不同成员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支持革命活动，不仅为周永开的革命道路扫清了诸多障碍，更让他亲眼见证了信仰的力量能够超越身份差异，将一家人紧紧凝聚在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旗帜之下。这种独特的家庭成长环境，成为周永开后来严以修身、廉洁齐家的重要精神源头，也让他更加明白，良好的家风既是家庭内部的精神纽带，更是投身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道德支撑。

周永开的妻子吴应明也出生于巴中最为贫苦的农民家庭，她的娘家生活极其艰难，祖孙三代人仅靠着爷爷那一块被称为“养老田”的薄地勉强维持生计。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她的哥哥不幸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拉壮丁，最终惨死他乡，这个噩耗让她

的母亲悲痛欲绝，最终因伤心过度而患病离世。年幼的吴应明就这样失去了至亲，孤苦伶仃地长大，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童年“纯全是黄连水灌大的”，充满了难以言表的苦涩。15岁那年，命运将她带到了周永开家当童养媳，然而婆家的境况同样困顿不堪。她常常需要回娘家背柴火，因为“不回娘家背柴，婆家就连锅都烧不热”，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因为吴应明是童养媳，受制于封建礼教她要默默忍受继母的严厉管教，日复一日“无声无息地劳动”。这些苦难的经历像一把锋利的刻刀，在她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生活的磨难让她对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乡保长拉丁派夫的恶行深恶痛绝，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不仅塑造了她勤俭坚韧的性格，更对她日后支持周永开形成清正廉洁家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永开他不仅自己一生清正廉洁，更是三令五申地给家人约法三种，任何人都不能收受别人的人情送礼，面对确实推不开的群众谢礼时，周永开要求妻子必须回赠等额或超额财物。吴应明也确实按照周永开的要求做了，

（二）周永开的清正廉洁家风故事

1. 勤俭家风代代传

周永开的父亲周作乾一八八二年正月出生于化成镇周家螃贫苦农民家庭，一九八五年正月初八辞世，终年一百零三岁。生母黄娘早逝。继母翁仕秀一九八八年十月去逝。周父一生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四种社会形态，均以农耕为主。青年时期当过长工、佃户，从迫于劳动为生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劳动光荣，永保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一生爱子女、爱党、爱劳动、爱社会主义。在旧社会，家境十分困难，还是送周永开到化小、奇中读书，中共川

北地下党组织在化成活动期间，倾力支持儿媳加入中国共产党，还秘密为党站岗放哨，保藏秘文。

周父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意识却相当开明，不循养儿防老、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的封建意识。建国后，周永开虽然长期在县地(市)作主要领导，他从不以官父自居，从未要求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亲友谋私利。他生活习惯良好，胸襟开阔、生命不息、劳动不止，早睡早起、风雨无阻、乐于田园、粗茶淡饭，一生长寿。据说，周父曾在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如果他不为人民谋幸福，就是忘本变质。周永开给父亲立了一把锄头和一个斗笠组成的墓碑，将他的一生总结为“父魂”。在周父影响下，周永开兄弟姐妹及其后人都靠自己的勤劳，踏踏实实干工作。

1968年春节，周永开的大儿周南生代表全家到渔溪“五.七”干校看望，他见父亲每天扫街，从万寿宫到经营站——猪市梁——堰塘湾至渔溪小学校，少不了2000米。为缩短时间，让父亲多休息一下，便主动拿起扫把帮忙。周永开本想拒绝，但他心想年轻人有这片孝心便给了这个机会，让他体验一下也好……于是，他没吱声。第二天，大年三十父子俩揩一背箕青菜和过年吃的猪脚杆等物，到离学校数十米远的冬水田边一个水坑淘洗，冬水田面上结着一层水，周南生把淘洗好的猪脚杆放在冬水田的冰面上，打算把青菜淘洗完了一起拿走。没想到猪脚杆滑落到水坑里去了，周永开毫不迟疑，迅速脱掉衣裤跳入水坑抓了起来，浑身冻得发红。儿子周南生痛惜地说：“爸，有我在这儿，一根猪脚杆用得着你这样奋不顾身吗？”周永开没吭声，回到住地寝室以后，他对儿子说：“当前物资紧缺，这么大一根猪脚杆弄掉了，大家怎么想？再说又是新年大节，大家都指望着哩。你爸到干校来，是要通过诚实劳动改

造思想的，这么一件小事都没做好大家怎么看……。”儿子听后认同到说：“爸，我明白了，你做得对!”。

周家老屋是周永开家族的祖业，这里是中共川北地下党组织、中共巴中工委、中共通南巴平中心县委自 1946 年开始的秘密联络活动中心、秘密情报交换中心、秘密决策指挥中心；也是他入党开始为党工作的地点，是从组建中共巴中县委起至解放前夕县委秘密办公的地方，是策划、组织、指挥地方武装、消灭国民党溃军、迫使国民党师长张咸三谈判、投诚签字的地方，是重要的红色文化遗产。几年前，周永开的子女们都在承诺书上签了字，一致同意将所有祖业资产全部捐献给中共巴中市巴州区委，作为研究地方史的见证。他自掏腰包花了 4 万元钱维修保护，后经巴州区委党史办的同志多年来的积极努力，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川北地下党组织活动旧址群进行保护。

为了避免后人关于祖屋的产权纠纷，2012 年，周永开再次让长孙女周婧(长子周南生之女)代表全体家庭成员，当着党史办和巴中地方组织的同志，以及周家其他旁亲的面，再次选读了周家老屋房屋捐献承诺书念一遍，打消任何人反悔的念头。以此证明，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个人不留所有财产，哪怕是价值几百万、几千万，都应交给党和人民。他们夫妇的所有积蓄，都要交给党组织。希望儿女们“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

2. 夫唱妇随，严管“小家”

15 岁的吴应明与周永开结婚后，努力想要送丈夫读书，以求未有保障的生活。她一夜纺四两线子，三天织两截白布，只好背着继母这个“严管家”，口落肚攒，积

蓄私房，帮助老周念完小学又上了中学。想要“发狠些，把老周的书盘出来，当个先生，不被拉壮丁，平常能拿个油盐钱回来就好了。”最初，周永开读书也很卖力，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连族长见了也动了心，夸他有天分，又勤奋，将来定能光宗耀祖，甚至愿拿出一笔钱来帮补。后来，周永开在王朴庵等人的引领逐渐周上了危险的革命道路，成天不是与一帮既不沾亲又不挂戚的“客人”，朝天暮日在屋里叽叽咕咕闲扯，就是走东家串西家，半夜都不落屋。吴应明经历最初的失望和煎熬后，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她常常自觉晚上她家开会的地下党员们，把板凳拖好，给每人递上杯热茶后，自觉退到隔壁纺纱织布，用呜呜的纺车声和吱吱的织机声，漆黑寂静的夜晚为周永开他们打掩护，并在深夜躲在屋外的阴暗处为他们当暗哨。有时候大家太累了，不得不在他家小憩一会儿，她就睁大眼睛守在一旁，等雄鸡叫过头遍，才轻轻喊醒大家，护送大家安全离去。有人要到外面去活动，她便从机头上扯一截布，送作路上的盘缠，或作秘密工作的掩护。

当吴应明得知周永开和那帮“无所事事”的人，真的就是共产党，就是一九三三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后，认为穷人的生活又有了盼头。她一改之前的担惊受怕，大胆地支持了周永开的革命工作，后来还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巴中县较早入党的地下党员之一。因为吴应明命苦，人又内向少言，与人同路十里都没得半句话，经常去娘家背柴背菜，沿途的三岁娃儿都认得她，一天上下十次也没人瞅睬她。她常常借上山捡柴割草及赶场回娘家的机会，为地下党组织运送物资和传递情报。有一次，地下党员们正愁找不到一个稳妥的人运送手榴弹，她对着火塘，默默地望着大家，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那地方离我爹那里不远。”第二天半下午，吴

应明主动请缨，背着满满一背萝卜，下面藏着要运送的手榴弹，埋着头径直从哨兵面前走了过去。大西南解放前夕，巴中的形势也日渐吃紧。周永开被派到外边去和上级联系，不幸在仪陇翻车，到成都又险遭逮捕，几来几往落不了屋，只得藏进山里。为了让躲在山里的周永开方便吃饭，吴应明将米煮成饭，再将米饭炕成可以长时间保存的锅巴，经过数次探寻找到周永开的藏身处，在清晨躲开团丁的收山活动，成功将情报和吃食送到周永开的手中，以朴实无华的行动，在川北地下革命的烽火中书写了夫唱妇随的动人篇章。

出身贫寒的她，十五岁嫁入周家，面对“拉壮丁”的恐惧，她以彻夜纺线织布的辛劳，默默支持丈夫周永开读书，只为“不当壮丁、拿油盐钱”的朴素愿望。当周永开投身地下党工作，她从最初的忧虑——“把老周的心拴在书上”，到逐渐窥见革命的微光。在丈夫的带领和革命实践斗争的锻炼中，她实现了真正的蜕变，是从胆小怕事性格内向的农妇，蜕变成“坚定”胆大的地下党员。吴应明的革命轨迹，是千万普通群众觉醒的缩影——从为小家求生，到为大家赴险，在信仰的感召下，她用最朴素的勇敢，成为川北地下革命中一颗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周永开担任巴中县委主要领导后，他一家老小夫妻七口长期住在县委小礼堂右侧两间木板屋里。房间小而狭长，光线又暗，地面又潮湿，冬冷夏热，仅能遮风蔽雨。因为房间面积太小，就在屋檐下，撑起一把伞，搭起灶台就煮饭炒菜。后来虽然几次给他调整住房，都被婉言谢绝，一直住到调离巴中为止。一次，有个农民反映问题到周永开家里，看见他家七个人围坐一张矮木方桌，桌上摆了两样素菜：一盘泡菜和一盆菜汤，而且饭菜都不多。那农民很受感动，回到农村，逢人就讲这件

事，讲到最后便感叹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的一个县委书记，竟然住的那样差，家具那样简单，过的生活是那样清淡，简直比国民党的甲长都不如！”面对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吴应明无怨无悔地支持周永开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吴应明在巴中县糖果厂当工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巴中县二轻局在选该厂厂长时，工人们一致推荐她担任厂长，二轻局据此而行了文。周永开看到文件后，立即通知二轻局长到办公室，以吴应明文化低为由而不同意任命，尽管局长反复讲任职理由，周仍不同意，在无奈情况下，局长便说：“我们现在找不出合适的人，先由吴应明同志代任吧！”最后，吴应明才代任了厂长。1971年她随丈夫周永开调达县，先在冰糕厂当工人，白天推着板车在大街小巷卖冰糕，继后调地计委。1978年，地计委领导根据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爱岗敬业的突出表现，加之她是老地下党员，资历深被任命为地计委科长(副县级)，文件也发了。时任地委副书记的周永开，知道情况后，拿着文件去找地委李香山书记，对香山书记讲：“我爱人吴应明，虽然优秀，可是文化程度不高，理应让贤，请求收回文件”。李书记在他再三请求下，只好尊重了他的意见，并将周书记意见转知地委组织部撤消了任命。对此，吴应明也没有什么怨言，接受丈夫的安排。

3. 廉洁用权

1960年，周永开的父母都已七十多岁了，只有小儿子周永科在身边照顾。因为国家三线建设开展，急需工人修建襄渝铁路，周永开毅然决定叫弟弟永科去万源修万白铁路，父亲大力支持。周永科到工地后也和农民一样，干的都是开山劈石、筑路修桥等活儿、险活、难活，施工中风险很大。周永科在一次施工中不幸以身殉职，

围绕安葬的问题，亲友中有人主张叶落归根回故土安葬。他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战场牺牲后，埋骨朝鲜的事例说服亲友，将弟弟就近安葬在万源，并劝慰家人弟弟的善后事宜由政府按同类事件处理，家属亲友不要提出任何非份要求。后来，他每到万源路过弟弟周永科的墓前，都要默默到坟前致哀。

他的胞妹周永伟，解放初成立县邮电局时，就首批参加工作当话务员，工作称职而且很积极。1962年，中央发出“精简干部下放支援农业生产”的号召，邮电局将精简下放的花名册呈报给县人事科，科长在报告上批示：“除周永伟以外，其余人员一律下放”。周永开得知此情后，迅速到县邮局去做妹妹的工作，他向妹妹说：“全县人民在最困难的时期修建了全省第二大水库——化成水库，现在正需要更多的人去完善它。我们老家蟒堂坝村直接受益，为建设新农村，你应回到农村。”妹妹听了哥哥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明白哥哥的意思，不能因为自己亲哥哥是县委领导就特殊，而不响应下乡号召；同时又想到自己爱人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一个模范的军属，她也要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因此，周永伟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愉快地回到农村，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评为五好社员。他妹夫从部队转业后，分在化成农具厂工作，任党支部书记，带领职工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发展企业，业绩突出，所在的单位也被评为四川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个人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工作者。1984年，全国开展落实相关政策，清查周永伟1962年来被精减的原始批件，符合规定，应落实政策。巴中县邮电局将周永伟的相关材料汇报给时任达县地委副书记的周永开，他仍坚持1962年中央精简下放的政策是正确的，其妹周永伟精简下放是执行党的政策的具体体现。

周永开的大姐周永莲及姐夫罗世缘，是周永开从读书和革命道路上给与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罗世缘家地处大山深处的罗家河，虽然闭塞，但深知弟弟永开和他的同学是在干有关为穷人翻身的大事，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尽力安排，而且还自觉地担负警戒工作，这使永开和他的同学倍感温馨与安全。1968年，周永莲的小女儿罗启明高中毕业，当时的化成公社小学聘请了她在罗家河村小任临时代课教师，至1974年，病倒在讲台上。周永莲给时任达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弟弟周永开写信，希望能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下女儿罗启明的就业问题。周永开接信后，心潮起伏跌宕。只要他开口向有关部门悄悄暗示一下，事情肯定能办得十分圆满的。然而，他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做，人民没有赋予自己这种权力。最后，他深情地回应他姐姐：“姐，我手中有这个权，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可不能以权谋私乱来呀！”并嘱托外侄女罗启明：“你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去开拓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来！服从当地政府的安排。”1978年，周永开的外侄女婿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转业前，他也给其舅父周永开写过信，希望时任达县地委副书记的周永开能对口将其安排在交通部门。周永开也同样在自己心灵的天平上掂量了私情与原则这两个砝码后，他必须毫不含糊地作出选择，自然没有为外侄女婿开方便之门。外侄女婿心地坦然地服从分配，被安置在巴中新办的磷肥厂，后转为水泥厂。因为水泥厂效益极差，加之侄女罗启明结核性脑炎三两天就得住院治疗，一家人生计举步维艰，侄女希望舅舅将其丈夫调动到工资有保障的单位工作。周永开热情地接待了外侄女罗启明，耐心地开导她们要看到水泥行业的光明前景！临走时，周永开特别给侄女强调两点：“一要爱岗敬业，努力学习和工作。二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打着我的牌子去找人说情更换

工作!”。后来，侄女婿靠自己，不断进取，工作业绩突出，成为了巴中市农机局的主要领导。

三、刘伯坚和周永开家风的当代启示

（一）刘伯坚家国情怀的当代启示

刘伯坚同志“生是为国家、死亦为国家”的崇高家风，深刻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家风传统，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它启示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培养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品质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宝贵财富，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更要传承和弘扬这种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成大我的崇高精神境界。

（二）周永开勤俭廉洁家风的当代启示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周永开“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的勤俭理念，为我们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提供了清醒剂。它启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不能丢，要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将勤俭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从点滴小事做起，珍惜每一度电、每一张纸、每一粒粮食，让勤俭之风吹遍社会的每个角落。

周永开与吴应明“夫唱妇随，严管‘小家’”的故事，则为新时代家庭建设树立了典范。它告诉我们，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风

气。在家庭中，夫妻双方应相互扶持、相互监督，共同营造清正廉洁的家庭氛围。尤其是党员干部家庭，更要时刻保持警惕，筑牢家庭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成为权力寻租的“白手套”，以良好的家风涵养清朗的党风政风社风。

周永开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始终坚守廉洁用权的原则，不搞特殊化，不徇私情，其行为深刻诠释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这对当代党员干部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雷池、不碰红线，永葆共产党员的清廉本色。他将弟弟周永科安葬在万源、动员妹妹周永伟下放农村、拒绝为外侄女解决就业等一系列举动，彰显了他大公无私、不徇私情的高尚品格。这启示我们，在处理公与私、情与法的关系时，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摒弃特权思想，不搞家族式腐败，不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周永开勤俭廉洁的家风，不仅仅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宝贵财富，更是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以周永开为榜样，自觉传承和弘扬勤俭廉洁的优良家风，将其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刘伯坚和周永开家风文化助力巴中家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刘伯坚家国情怀助力巴中家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刘伯坚同志深厚的家国情怀为巴中地区发展良好家风家教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引领和实践指导。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同志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挖掘：一是要弘扬刘伯坚同志爱国爱家的伟大精神，通过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将他的先进事迹融入家风建设中；二是要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刘伯坚同志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三是要创新教育形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刘伯坚同志的家风故事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四是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把刘伯坚同志的精神品质转化为具体的家风建设标准和要求。通过这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让刘伯坚同志的家国情怀在巴中地区落地生根，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二）周永开清正廉洁家风的巴中推广策略

周永开是依然健在的巴中籍老党员老干部，他的清正廉洁家风对巴中家风建设具有强大的榜样作用。巴中推广学习周永开家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推进：一是梳理周永开同志的廉洁事迹，编纂成地方特色教材，纳入党员干部培训体系，让廉洁理念在干部群体中入脑入心；二是打造廉洁文化示范点，在社区、村镇设立专题展览区，通过实物展示、场景还原等方式，生动再现他严以修身、廉洁齐家的生活片段；三是开展“廉洁家风进万家”主题活动，组织文艺工作者创排以周永开家风为原型的戏剧、小品等作品，深入基层巡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廉洁正能量；四是建立家庭助廉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家属签订助廉承诺书，定期开展家属廉政座谈会，形成“夫妻共廉、家庭助廉”的良好氛围；五是周永开清正廉洁家风融入地方治理，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中增设廉洁条款，把家风建设与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崇廉尚俭的社会风尚。六是在身体允许的情况，邀请周永开夫妇给巴中主要领导干部现场讲授，如何妥善处理公权与私情的关系，再通过干部回去层层宣讲。通过这些多层次、全方位的推广举措，使周永开的清正廉洁

家风成为涵养巴中政治生态的重要文化资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